

浙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20世纪文学演进与 『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吴秀明等 著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它是直抵人心的，用文学形式来表达对中国形象的感知，其影响往往是深远而悠长的。
汉学家顾彬先生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虽然以偏概全，比较武断，但却的确击中了我们文学的要害。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世纪文学演讲与
『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吴秀明等著

浙江学术文库
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文学演进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 吴秀明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308-15723-0

I. ①②…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697 号

20世纪文学演进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吴秀明 等 著

策 划 者 曾建林

责任编辑 叶 抒

责任校对 余月秋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723-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编号: 2015CBB10)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吴秀明

编 委

黄 健 陈力君 方爱武

张广海 章 涛 戴 怡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形象概念界定与当下意义	1
二、寻求拓展的路径与方法	3
第一章 近代文化与中国形象新起点	8
一、传统意义失落与中国形象命题的提出	10
二、“学习西方”与中国形象的文学展现	19
三、现代文明视阈下中国形象的文学想象	27
四、现代审美观念兴起与中国形象重构的路径	35
第二章 现代文学与中国形象的建构	44
一、现代文学内在形态与谱系分类	45
二、启蒙者形象谱系：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	46
三、革命者形象谱系：初探者、内困者、超越者	62
四、自由者形象谱系：寻梦者、游离者	93
第三章 当代文学与中国形象的重塑	111
一、革命者形象的重塑	113

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凸显	142
三、中国形象重塑的历史经验	159
四、中国形象重塑的矛盾性特点	173
第四章 中国形象的台港澳书写	179
一、孤儿形象：殖民文化下的中国叙事	179
二、原乡形象：政治文化下的文化乡愁	185
三、他者形象：现代文化下的漂泊情怀	191
第五章 中国形象的影像化表达	198
一、中国形象影像化的历史与现实	199
二、中国形象的影像史流变	201
三、中国形象的影像形态	210
四、异域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表达	219
结 语 中国形象是“世界想象的共同体”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38
附 一 阶级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形象塑造	240
附 二 文学的中国想象与跨越	260
索 引	283
后 记	285

绪 论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在全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有关“中国形象”(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中国形象)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文学作为与社会文化既同构又超越的审美意识形态,在这一历史关节点上如何承担时代使命,这个问题已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众所周知,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此后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历史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原因则摧伤了中国人曾有的盛世气魄,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才又一次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新的时代和国际化环境不仅为文学的中国形象重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也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量事实表明,当下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在内外多种合力的作用下正在经历一场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只要把握得当,我们完全可望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贡献。

一、中国形象概念界定与当下意义

本书所说的中国形象是指有关中国的艺术想象与认知。它不仅指的是一种涵盖国家与民族意义的国家形象,同时还可以是一种有关中国的历史形象与文化形象,抑或构成中国形象各色的本土形象与个体形象。总之,它源于现实

而又高于现实,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阿 Q、朱老忠、梁生宝等人物形象有所不同,带有整体泛指的特点,具有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的成分和审美建构的特质,是集合性乃至形象化比喻的一个概念。“中国形象”不妨也可称之为“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现有的不少研究就是这样将其互置的),但本书同仁经过讨论,还是主张使用“中国形象”而不是“国家形象”、“民族形象”这个概念。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超越狭隘的民族或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多一点开放性,少一点防御性,站在更高、更客观的层面看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在众声喧哗的阐释中进一步确立自我的本体位置。因为“中国形象”背后隐含着“美国形象”、“法国形象”、“日本形象”及“他者形象”,这是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概念。它也反映了我们与“他者”平等对话、共同书写,把中国形象及中国文化看成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样一种理念。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多方面力量合力打造的,中国既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彼此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价值。因而,全球化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就超出了简单的纯文学、纯文本研究,程度不同地具有跨学科乃至跨国界的研究特点,并与国家有关“文化强国”发展战略以及诸多敏感复杂的学术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联系在一起。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20 世纪中国的曲折历史也造就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跌宕多变,特别是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昨天、今日和未来。一方面,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发展与 20 世纪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密切相关,正是 20 世纪中国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一系列主题派生了相应的文学主题;另一方面,20 世纪中国文学又是中国形象建构的最有效的载体,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践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形象的一种建构过程。20 世纪中国形象的建构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互动,实在积累了太多需要认真清理的经验。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塑造,严格地讲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驱在继承近代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站在现代启蒙的文化立场,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挚爱之笔书写了阿 Q、祥林嫂、孔乙己等一批落后不觉悟的农民、妇女和文人,为中国形象的塑造筚路蓝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不过,那是文化批判时期中国形象的塑造,它主要依据西方“异质文化”的评价标准,更多看到和发掘的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弹指之间百年过去了,中国在

经过沧桑磨难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社会也由文化批判进入了文化重建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日趋广泛的影响,中国形象塑造更是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内涵上,普遍重视民族文化优质资源的开发,包括优质的精神资源也包括优质的艺术资源的开发;表现在外延上,则充分注意它在跨文化、跨区域、跨语际下的丰富复杂多样的存在,将一个比较“民族性”的命题延伸和拓展为“全球性”的话题。这种变化尽管是初步、粗糙的,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但它毕竟反映和折射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当下的精气、神,说明我们开始真正找回了那份应有的文化自信,它是我们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表现。而这,在文学日趋世俗化、娱乐化的当下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不仅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生成点,而且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点,它蕴含着文学创新和突破的种种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研究刚刚开始,现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异域“他者”的观照层面,如周宁主编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外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等的《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以及中国学者论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如张志彪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等。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文学来说,对“异文化”形象塑造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还是本土文化体系之内的形象塑造。这也是一个国家整体文学及其形象塑造的主体与关键所在。为了改变上述这种状况,充分发掘中国作家特别是中国大陆作家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使之成为“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为了有效地拓展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为之提供一个新的向度和阐释空间,我们认为在当下选择这样一个基于文学又超越于文学的大文化、跨学科课题,运用形象学的方法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总结与梳理,是比较合适的,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个需要花力气,并且值得花力气的重要课题。

二、寻求拓展的路径与方法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如何塑造”涉及20世纪中国多

元共生的完整生态链,其中,作家的创造主体无疑承担着最重要也是最为基础性的作用。只有从根本上提升作家的主体认知和创造活力,才能有效推进中国形象的塑造,使之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拓展。

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语境中,怎样进行中国形象塑造呢?它的提升和拓展的路径与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关键要厘清如下三个关系:

首先,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虽是鄙无新意的“老话”,但它对中国形象塑造来说,的确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文化全球化当然不是指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而是强调全球文化的互融共生、多元多维。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是各民族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往往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此所谓的民族性,指的是与世界性(主要是西方性)相异的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存在,它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非常突出的阶级革命话语书写,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0 世纪中国形象的书写如果回避中国纷乱的政治与战乱现实,那么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就很难说是真实的。像域外有的文学那样完全剥离中国形象的政治元素,这恐怕只能说是心造的幻象。再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京派文学”和 80 年代的“寻根文学”,它们有关中国形象的塑造都展现出了浓重的民族特质。如果这些民族性都被西方所谓的普世性所替代,中国形象就丧失了它的“根性”的存在。

当然,我们强调中国形象的民族性,并不是排拒对世界普世化的价值追求,将自己锁定在一个封闭狭隘的空间,而是意在通过这一特殊的个别去透视把握人类共有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我们所说的民族性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与世界普遍价值相通,它内在地具有开放开阔的全部视野,它以人类共有普世价值作为参照。它既是地域的,也是世界的,是地域与世界的有机交融;借用《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的话来说,就是“文学最终是要在个性中寻求共性”^①，“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我把这概括为跨族别的写作”^②。也正是这个缘故,阿来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藏族叙事不仅得到了中国其他民族的认同,而且已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国外传播,备受海内外的广泛好

① 阿来:《通往可能之路(谈话录)》,《文艺报》1999 年 7 月 10 日。

② 阿来、孙小宁:《历史深处的人生表达》,《中国文化报》1998 年 3 月 31 日。

评。可见民族性与世界性是既矛盾又可统一的。如果协调处理得好,它不仅给作品平添独特的思想艺术张力,而且还可有效地显现文化的丰富多样的魅力。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成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所谓的“用世界眼光讲中国故事”,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也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和角度,才会重视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情感、中国话语的表达;因为它讲的虽是中国,但却反映了人类和世界共同的精神思想情感,特别是当下世界和人类共同的精神思想情感,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显现一种大胸怀、大视野与大境界。总之,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上,任何的偏至或偏执都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兼顾,维护一种动态的平衡。

其次,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悠久辉煌举世皆知。只是晚近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才产生了文化危机,在与西方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愈是在劣势的情况下,我们愈是要保持文化自信。落实到创作上,我们的文学形象塑造就要善于发掘本土文化的精华,而不能一味依赖并屈从于西方的文化意识,把自己“他者”化,用“他者”来取代自己。应该说,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是有明显改观的。也许是与大国崛起有关,从文坛、学界到政界、传媒,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怀旧热。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仅成了自上而下的普遍共识,而且也成了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智力支撑。中国人也由此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构建活动,它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梦,也只有依托民族文化之根;大量的事实证明,简单地照搬西方,用西学取代中学,因不合中国文化和国情实际,是行不通的。也正因此,我们高度评价自寻根文学以降直至今日的文化复兴思潮,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体现。

但讲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他者”而搞所谓的文化自恋。因为后者,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文化一体化意识形态。它极易导致文化自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塑造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停滞的中国形象。应该说,这样一种文化思潮直至今天还是存在的,它成为引发“民族主义”的思想温床。比较典型的,如1996年坊间流行的那本题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通俗读物,还有前些年央视播放的《百家讲坛》中的不少节目。

这一切,虽然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不必讳言,内中的确也夹裹不少盲目自恋的成分,自我反思是很不够的。正如陈平原所说的:“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①这就很容易导致在进行中国形象塑造时,将其民族“劣质”的一面不应有地予以忽略,相反“优质”的一面则被不适当地夸饰。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它无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无助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乐黛云谈到民族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生成性对话”,也就是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碰撞而产生新的思想。她说:“这样的‘对话’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自觉,对别人的文化也要有同情的了解并作出自己独特的、有益的解释,不能仅仅按照一方的片面理解和利益去覆盖另一方,希冀另一方接受。如果把‘他者’完全置于自己的文化想象和利益之中,‘他者’的特殊性就会被剥夺,被同化,对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她认为,“对话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你打我通’。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对话,不是特点消失的合金式的‘融合’,而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一种文化才有可能对他种文化产生吸引力。”^②这对如何处理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关系,无疑是有启迪的。

最后,是创造性与再造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总体而言,就是对西方文学模仿性的一种“再造”,包括文学观念的再造与创作方法的再造,它使中国文学借此摆脱了旧文学的桎梏,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就此而论,再造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再造毕竟只是学习和模仿,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终极追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模仿太多而暴露出来的问题更突出,这样也容易养成作家惰性的思维习惯。一俟离开了模仿者,自己似乎就不会言说了。为什么新时期以降,在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塑造问题上,我们往往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面,在急切忙乱的模仿中喘息不已,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的趋势,

① 陈平原:《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3日。

② 乐黛云:《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

都可从中找到答案。这也再次说明：“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①这里成功与否，关键还是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赋予全新的创造和独到的发现，并注意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对接。再夸张一点说，就是给世界和人类提供原创性的精神和艺术。这也是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最重要，当然也是最高的一个标准。由之可见，此所谓的创造性，即指与民族本土交相互融的一种精神艺术实践，它是对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富有趣味的一种反映。这也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具有一种深刻的穿越现实、解读当下现实的能力，不能回避社会矛盾和问题，并重构价值。而这，恰恰是现今中国形象塑造所缺乏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不无一定的道理。它虽然以偏概全，但却击中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要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中的梁生宝等一大批当代中国新人形象（或曰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有必要引起重视。他们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对一种新的文化以及与此相谐的新的形象作了探索，并赋予了浓重的精神钙质。而现在，我们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解构”旗帜下将文学应有的理想、英雄、崇高和浪漫一概抹去。于是文学就流于轻巧与肤浅，书写的人物被严重物欲化了。而这样的作品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原创性，形象地反映和概括今天中国的精神思想呢？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和中国形象这个话题，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唯其如此，它才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① 肖向明：《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第一章 近代文化与中国形象新起点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传统的泱泱大国的中国形象也随之一落千丈。空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使广大仁人志士开始强烈关注和思考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层面,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开始大规模地传入,在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一批知识分子打开认识世界的文化视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和“师夷制夷”的主张,强烈要求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自强,洗刷民族的耻辱,从而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许多仁人志士开始从理论到实践,探求挽救危机中的民族和国家的方略,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自强之路。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大力批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业、商业,富国强兵,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到后来,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包括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人,或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倡导、呼吁和推动下,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说,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出现,并在思想文化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于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民族意识和“家天下”的政治

国家学说的解构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人们对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共识。

在文学领域,所出现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始自发地表达了对“自由”、“新民”、“新国家”、“新政治”、“新道德”、“新风俗”等极具现代性价值的诉求。在“诗界革命”中,黄遵宪提出了著名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对诗坛上的拟古主义,要求突破古典格律诗对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束缚,但深藏其背后所表达的则是渴望“自由”的现代思想观念。他的《今别离(其一)》的“咏轮船火车”一诗,尽管还是旧体的格律诗,但所透露出来的是对自由思想、对新文明的赞美之情。从思想文化的价值属性上来说,这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价值元素的。梁启超则是就将“新小说”与“新民”、“新国家”、“新政治”、“新道德”、“新风尚”等直接联系起来,要求新的小说应具有“新”民族国家的特别功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通过对“新小说”的鼓吹,实际上也就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巨大想象空间,提供了一种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方式。如同李欧梵所说,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所提出的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文学领域内出现重塑中国形象的诉求,是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催促下而出现的。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因为现代是一段历史时期,所以不从历史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就会造成混乱。”^①就近代中国境况而言,遭遇西方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是迫使中国不得不放下“居四方之中”的“天朝大国”姿态,而认真审视自身困境的重要外在因素,而中国社会和文化所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则是重新考量自身形象定位和重塑的重要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基于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现实,在文学领域内出现重塑中国形象的要求,有着内外的双重因素,既有来自全球化进程中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的外在压力,也有中国社会、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驱力。因此,源自内外的两种因素,共同形成历史的合力,促使中国文学在谋求自身的演化发展的进程中,

^① [日]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转引自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将重塑中国形象的主题纳入其中,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开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传统意义失落与中国形象命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对自身形象(也即国家形象)的认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规约。《中庸》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乃为“普天之下”也。《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传统的中国形象是基于“天下”的中心观念而进行区域的认知和划分的,故中国有“九州”之说,从而形成“居四方之中”或“九州方圆”的中国形象的基本认定。《礼记·王制篇》对“居四方之中”的“国家”内涵进行了具体的规约: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传统的“天下”观念,对国家形象的规约和塑造并非是纯粹观念性的,或纯主观认定性的,而是以区域的范围和民众的生活为实际内容的。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划分为大大小小的“国”,政权、朝代也常常发生更迭,但“天下”的观念却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清代自入关立国以来,朝野上下也都是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实行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洋的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几乎“浑然不知”。魏源就曾激烈批评当局:“惟知

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番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谈，尤易凿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①这种对国家的认定，势必反映在文学的创作观念之中，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根据历史学界的观点，通常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看作是中国被置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② 在滚滚的全球性现代化浪潮中，中国所遭遇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这种冲击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等层面上，同时也表现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心理等层面上。美籍华人学者张灏认为，遭遇世界性冲击的中国文化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这种危机导致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终极关怀——以儒家基本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发生基础性动摇；精神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世界不足以支持现代人生；传统文明的失重引发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危机。^③ 他指出：“‘意义危机’的源头如同人类历史那般久远，而在中国一如其他的地方，对敏锐的心灵来说，生命与世界的根本意义经常是吸引人的问题。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藉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Weltanschauung and Lebensanschauung）。”^④ 这种分别发生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上的终极关怀失落，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并迫使人们开始重新

① 《魏源集·圣武记附录卷十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16 页。

②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内涵有所不同。根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高级咨询专家洛威尔·布莱恩和黛安娜·法雷尔在题为《无疆界市场》（Market Unbound）的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国际化”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通常是两国之间）跨越国界的交往活动，而全球化则是指超越所有国家界线的交往活动。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将发生在 19 世纪初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产品与资本的对外扩张，以及所伴随的对外侵略与殖民活动，看作是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序幕或前奏，或者说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进程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发展，必然引发全球化的浪潮。参见[意]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 and 解释》，梁广严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 年第 7 期；张洪贵：《国内“全球化”研究综述》，《当代学术信息》1999 年第 5 期。本书赞同这一观点，并采用这种说法。

③ 参见[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 年第 4 期。

④ [美]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 页。